

明末清初杜诗学研究

刘重喜 著



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专刊·第二辑

中華書局

明末清初杜诗学研究

刘重喜 著

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专刊·第二辑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末清初杜诗学研究 / 刘重喜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9

(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专刊·第2辑)

ISBN 978 - 7 - 101 - 09539 - 5

I. 明… II. 刘… III. 杜诗—诗歌研究—明清时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1529 号

-
- | | |
|-------|--|
| 书 名 | 明末清初杜诗学研究 |
| 著 者 | 刘重喜 |
| 丛 书 名 | 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专刊·第二辑 |
| 责任编辑 | 王传龙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3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34¼ 插页 2 字数 560 千字 |
| 印 数 | 1-15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 09539 - 5 |
| 定 价 | 95.00 元 |
-

谨以此书纪念杜甫诞辰1300周年

总序

莫砺锋

七年前,在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成立一周年之际,我们在中华书局出版了由六本专著组成的《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专刊》第一辑。我以中心主任的身份为专刊撰写了一篇《总序》,其中说:“在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学术活动中,诗学一向是最重要的领域,也是最有发展前景的方向。我们所说的‘诗学’,并不是源自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的泛指文艺理论的 Poetics,也不是专指做诗、论诗的学问,就像唐人郑谷所说的‘衰迟自喜添诗学’或朱自清所说的‘所谓诗学,专指关于旧诗的理解、鉴赏而言’。在我们的理解中,‘诗’是广义的诗,即包括辞赋、词曲等文体在内的所有韵文;‘诗学’也是广义的诗学,即一切有关‘诗’的研究,包括对历代诗歌总集或别集的整理、编纂(例如重编《全唐五代诗》以及编纂《全清词》)、诗人研究(例如诗人年谱、评传)、诗歌研究、诗歌史研究、诗歌流派研究、诗歌理论研究等方面。近年来,我们还有计划地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诸如域外汉文诗话的整理、古代诗歌的文化学研究等。我们当然并不认为‘诗’就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全部内容,也不认为‘中国诗学’这个名称可以涵盖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全部学术活动,但是我们确信本学科投入力量最多、创获最大的研究方向就是‘中国诗学’。所以,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虽然是新成立的一个研究机构,但是其组成情况与南大古代文学学科基本重合,其学术渊源、学术路数以及学风倾向也与南大古代文学学科完全一致。在南大古代文学学科内部,我们一向尊重每个成员自己的研究兴趣,很少组织大规模的集体课题。因为我们相信,真正有价值的文学创作必然是高度体现个性的,同样,真正有价值的文学研究也应该是个性化的一家之言。除了大型的古籍整理之外,我们从不奢望编写出大部头的集体著作,而情愿向学界奉献单篇的专题论文或篇幅不大的个人专著。”转眼之间寒暑七易,我们的基本理念并无多大改变,故不避重复将上述观点逐录于此,作为对出版研究中心专刊第二辑之原由的简单交代。

当然,日居月诸,阴阳消息,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也不可能一成不变。首先,由于现今管理制度的规定,我们试行设计了一个名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与现代中国社会研究”的集体课题,并于2006年入选“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稍后通过竞标获准立项。这是南大古代文学学科动员多位成员集体撰写一本学术著作的首次尝试。经过几年的努力,此项目完成了最终成果——一本四十万字的著作,现已通过验收,即将以课题的名称作为书名公开出版。其次,我们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也尝试着做一些与研究内容有关的普及工作。我本人撰写了《莫砺锋诗话》、《漫话东坡》等通俗读物,多位中心成员在各地的电视台、公共图书馆等场所开设专题讲座,试图以多种形式向公众普及以古典诗歌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常识。第三,我们组织了一些著述之外的学术活动,比如在2006年与南大古典文献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中国诗学研讨会”,邀请了三十多所大学和科研院所、出版单位的学者前来与会,围绕着大家共同关心的诗学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会学者提交的学术论文已编为《谁是诗中疏凿手——中国诗学研讨会论文集》,由凤凰出版社出版。尽管有上述活动,本中心成员的主要精力仍然集中于与中国诗学有关的专题研究,而且仍然以个人的自选课题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不一定得到课题经费的支持,也不一定具有多高的学界关注度,但都体现着研究者对于某些诗学专题的思考和探索。作为这种研究的直接成果,中心成员又完成了八部专著,它们分别是莫砺锋的《文学史沉思拾零》、徐有富的《诗学问津录》、许结的《赋学:制度与批评》、巩本栋的《唱和诗词研究》、童岭的《南齐时代的文学与思想》、卞东波的《宋代诗话与诗学文献研究》、刘重喜的《明末清初杜诗学研究》、苗怀明的《从传统文人到现代学者——戏曲研究十四家》。我们将它们编成《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专刊》的第二辑,仍交中华书局出版。就像七年前出版专刊第一辑一样,我们对专刊第二辑的出版也不想作任何宣传,只希望将它们静悄悄地呈送到读者面前,并衷心希望得到读者朋友的指正。

本专刊的撰写与出版得到了南京大学“985工程”三期项目和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一期项目的资助,谨此志谢。

2012年5月30日于南京大学

序

张伯伟

重喜完成其著作《明末清初杜诗学研究》，付梓在即，嘱我撰序。我素来不好为人作序，但当重喜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我没有太多迟疑就答应了。可以轻易地为之寻找出很多理由，比如从大学时代开始我就是他的任课老师并指导了他的毕业论文，留校工作后因为我的一番话他开始每天阅读杜诗，后来又边工作边攻读硕士继而博士学位，论文亦围绕杜诗，依然由我忝任其导师，现在这部以博士论文增订而成的著作将要出版，又适值杜甫诞辰一千三百年，慨诺此序似乎是必然的，而且很可以从“私谊”的角度渲染成文。但为了避免写成一篇应酬性的文字，我想还是站在学术立场上谈论这部著作，重点在由本书引发而来的与当代学术相关的问题，以就正于读者。

“杜诗学”之名由元好问提出，“杜诗学”之实则出现在此前。千年以来，“杜诗学”有两个高峰，一在宋代，一在清代。前者是起始，后者是集成，而明末清初则是一大转折。这是对“杜诗学”史稍有关心者都了解的现象。学术研究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于精神文化的探讨，有两个时期最值得重视，一个是其开创期，另一个是转型期。所以，这两个时期吸引学者的高度注意也是理所当然的。以明末清初的“杜诗学”研究而言，只要参看一下本书附录的自1900年至2010年的研究论著目录（一定还有可补录者），就能用洋洋大观来形容。因此，选择这样一个课题，重要的思考就集中到如何研究上来。而对于“如何研究”的思考，一方面取决于自身的学术传统，另一方面则如禅家所说的“应病施药”，需要针对当代的学术状况及其“病症”。

学术研究无疑是从熟悉基本史料开始，并且应以“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尽可能巨细靡遗地收集相关文献。其后是对文献作初步的整理和分析。再其后，则选择最重要的问题以及最有力的史料写成论文。常见的缺陷在于，或者根据不够丰富甚至是很少的材料作出宏大判断，或者大量堆砌资料而将观点淹没在文献的海洋之中。如果做个大致的区分，

前者倾向于“思而不学”，而后者近乎“学而不思”。清代“杜诗学”文献相当丰富，其书目可考者达410种之多，而且集中在雍正朝以前^①。资料如此丰富，而本书需要考察的问题，又涉及到杜诗的版本、校勘、编年、笺注、阐释和评论等，兼容了“杜诗学”的各个方面。本书作者并没有采用敷陈法将上述问题铺展开来，而是在广泛阅读文献的基础上，集中在三个论题，以上中下三编作深入探讨，从而有效摆脱了通常容易出现的弊端。

上编是《钱注杜诗》研究，以此为核心，作者探讨了明末清初的杜诗版本、校勘、编年和笺注诸问题。《钱注杜诗》无疑是“杜诗学”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受到后人直至当代学人的高度推崇和重视。中国学者且不提，以“为读杜甫而生于人世”自命的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为例，他曾在家私下对另一位日本杜诗研究者黑川洋一：“注释杜甫要有钱牧斋的学识和见识，今日可以注杜者舍我其谁。”^②历代杜注在其心目中的对手仅为“钱注”。研究《钱注杜诗》可以从许多不同方面切入，版本、校勘等问题属文献学范畴，这在中西传统中都算得上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中国的校雠学传统，由汉代刘向、歆父子发轫，他们每校一书，必广罗异本、去除重复、条别篇章、校其讹误、写定正本，是一项严肃的学术工作。而就杜诗来说，综罗众本，校其异同，最后形成定本，这样的工作也开始于宋代。因为有异本，就必然会产生重复或异同的问题，最后的“定本”，也一定经过校勘者的更改，但其态度是审慎的。近年来，受到西方对抄本及印刷文化研究的影响，一些汉学家往往采撷某些笔记、诗话中“资闲谈”、“录异事”的材料，或者根据编纂者的丛残片语作“奇崛”解释，推广到校勘学的传统中，认为一部作品（至少在刻本时代以前）从最初写成到最终流传于世，经过了抄写者、编纂者大量的、随意的“歪曲”。易言之，这些经过宋人整理而流传下来的六朝人、唐人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据信的。这样的论述，与文学经典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更引申为文学史的“权力”。乍闻之耸人耳目，细究之似是而非。依我看来，文本的更改至少出于三类人：作家、批评家和校勘家。在对待文本的态度上，前两者追求的是“美”，而后者追求的是“真”。作家更改自己的文本，由于抄写时间不一，导致异文的流传，但都是属于该作者的作品。批评家更改他人的

①参见孙微《清代杜诗学文献考》，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

②“私は杜甫を読むために生まれて来た。”“杜甫の注释には、钱牧斋の学识と见识とを必要とする。それができるのは今のところ私以外にはない。”见黑川洋一《杜甫と吉川先生と私》，《吉川幸次郎全集》第十二卷《月报》，筑摩书房1968年6月版，第6页。

文本,常常以自己的审美眼光为去取标准,这在选本中尤其明显。所以,我们在遇到唐代或宋代选本的异文时,不能轻易地把这些异文认定为作品在唐宋时代的本来面目。但即便是这样的更改,也仍然是有限的。至于校勘家的更改,因为出于求“真”的目的,态度必然是审慎的,同时也会详列异文,以供读者参考抉择。以上三类人各有不同的取向,各种记载也分属于不同的文献性质,若不加分辨地混为一谈,就容易导致朱紫相夺。一个研究者,如果曾经从事过古代文本的校勘工作,就能够对工作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精神状态有所体会,而不至于在解读资料时,让想象的骏马无节制地奔驰,把“天际浮云”认作“地平线上的丛树”^①。本书以《钱注杜诗》为核心,细致展开其校勘思想和方法,对于传统校雠学中的文学学校勘活动,提供了一个具体生动的例证,足以代表中国文学文本编辑的主流。因此,尽管这是一项属于传统文献学研究的内容,其研究思路和方法也平实无奇,但对于当代学术“闻诡而惊听”(借用《文心雕龙·知音》语)的“爱奇”之风却或多或少能起到针砭作用。

明末清初的学者是以“章法”为中心探讨杜诗技巧的,故本书中编专列杜诗章法论,详细考察了这一时期“杜诗学”中的诗歌技法问题。“诗之为技”的观念,在钟嵘《诗品》中已明确提出,堪称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由来已久的传统,但文人颇不情愿把文章仅仅视为一“技”,总希望能够提升到“经国”、“载道”的高度,所以,即便在文学批评中有关于技法的讨论,也往往得不到重视。杜甫也曾言由衷地说:“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对于诗歌技法的讨论,从永明体强调“四声八病”到晚唐五代诗格,形成了一种“规范诗学”,涉及到声律、对偶、句法、结构、语义等诸方面。其中心思想,就是要在“诗”与“非诗”之间划出一条界限。只有遵循规范的语言表达才堪称文学,否则便是“吼文”、“狗号”、“不名为诗”、“非复文章”,原因很简单,就是“与俗之言无异”。这些都是对创作者提出的要求,从宋代开始,批评者也往往运用这些技法观念作文本分析,重点在句法和语义。所有的技法都带有规范性,因此,琐屑机械是其基本特征。经过反复训练而谙熟于心,创作者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旧有的规范,使得技法表现更为丰富。明清“杜诗学”中有关技法的讨论,既有从杜诗中

①“mistake some clouds in the sky to be forests on the horizon”,这是一个非常生动而著名的比喻,原出傅斯年对某著名汉学家的微讽,杨联陞曾在1960年西雅图举行的中美学术合作会议的致词中使用,含蓄指出美国史学家富于想象力(imaginative)而不适当控制的后果,为萧公权激赏,在其治学漫忆《问学谏往录》中两次引用。

概括提炼者,也有根据批评史上的观念对作品加以分析者。这些资料以往学者未曾注意,更谈不上重视了。我想要强调的是,第一,关于文学技法的讨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并不贫乏,中国人对于文学性或纯文学的认识,并不是在西洋学术进入后才得到启蒙。那种以“杂文学”或“大文学”来概括中国人的文学观念,以“载道”、“言志”、“美刺”、“褒贬”的“大判断”来概括中国文学批评的做法,如果不是无知,就只能说是偏见了。第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当然要讲究表达上的技法。将技法从文学中剔除,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消灭了文学。20世纪新诗运动起来,强调语言是白话的,文字是通俗的,音节是自然的,用韵是自由的,文体是解放的,以为这样就可以使文学获得新生。但中国诗歌传统是既重视情志也决不轻视技法的,“押韵就好”的“薛蟠体”之所以成为嘲弄的对象,一方面是其表达情志的鄙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不成文体”。中国文学批评不仅认为文学需要有形式,而且还拒绝平庸的形式。20世纪以来的文学观念则异于此,中国的白话文学运动从新诗开始,苏汶(即杜衡)概括为“做诗通行狂叫,通行直说,以坦白奔放为目标”^①。尽管后来有格律派、象征派的努力,但显然后继乏人。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重视形式,但将形式推到极致,也就把所有的文本都看成了文学,只要是“非实用地”或“诗性地”阅读,任何一种文字表达都可以被当作文学甚至是诗^②,实质上也就取消了形式的意义。至于结构主义者所说的“一旦把它按照诗的格式写下来,有关诗义产生的程式立刻就起作用了”^③,真是如此的话,歌诀口号岂不一律是诗^④。以中国文学批评的标准衡量,这只能是炉边烹茶啖栗的笑谈而已。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之所以能够获得“集大成”、“诗圣”等美

①《〈望舒草〉序》,陈绍伟编《中国新诗集序跋选(1918—1949)》,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37页。

②特瑞·伊格勒顿(Terry Eagleton)在评述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时曾经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如果我研究铁路时刻表不是为了换车,而是为了激起我对于现代生活的速度和复杂性的一般思考,那么可以说,我在把它当作文学阅读。”(If I pore over the railway timetable not to discover a train connection but to stimulate in myself general reflections on the speed and complexity of modern existence, then I might be said to reading it as literature.)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Limited, 1983, p. 9.

③这段话是针对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留给太太的一张便条而言:“是这么回事,我吃了放在冰箱里的李子,它们很可能是你留作早餐的。请原谅,它们真可口;那么甜,又那么凉。”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著,盛宁译《结构主义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页。

④这一点,在今人的一代总集的编纂工作中,似乎尤其需要有所注意。

誉,除了作品中所自然流露出的仁爱忠义,与他在知识储备上的“读书破万卷”和艺术追求上“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在今天,强调对艺术作品作细致的文本解读,学习古典作家在技法上的千锤百炼,文学才能逐步摆脱媚俗和速成。而对于传统文学的研究者来说,加强文学技法的研究,不仅可以弥补以往学术版图之不足,也能够为当代作家提供更多有益的借鉴。

文学诠释是一个古老而新鲜的命题。孟子提出“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就是文学诠释。而西方在 19 世纪兴起到 20 世纪大盛的诠释学(Hermeneutics),更是影响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本书下编杜诗诠释论所针对的就是这个问题。作者敏锐地注意到,明末清初的杜诗学者对于作品中的“意法”有一个非常辩证的认识。这里,我想从本书中引用一则材料来加以说明,陈之璠《杜工部七言律诗注·注杜律凡例》云:“诗,意与法相为表里,得意可以合法,持法可以测意。故诗解不合意与法者,虽名公鉅手沿袭千年,必为辨正。”记得最初看到这则议论,真有空谷足音之喜。如果把“意”理解成作者意图,那么“法”就是作品的表现技法,两者的关系乃如胶似漆、互为表里。但在 20 世纪以来的文学诠释中,意图被当成思想内容,技法则归为表现形式,处理这两者的通常方式,犹如旧小说中的话头,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我在三十年前写《李义山诗的心态》,开篇部分即指出:“写什么与怎样写,在有特色的诗人手中从来就是密不可分的。”^①所以,该文选取了李商隐诗歌表现的若干方面,如取景角度、空间隔断、时间迟暮、自然描写、比况古人、词汇色彩、句法结构和“无端”二字等,努力迫近其心态,目的就在于想通过“怎样写”(“法”)来探讨“写什么”(“意”)。尽管文章显得稚嫩,但这一研究思路直到今天,我认为还是有价值的。当时只是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针对 20 世纪以来文学诠释中的弊端,企图根据自己对于文学一知半解的认识,对那种状况有所改善或者仅仅是改变。但无可否认,三十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界在古典诠释的理论和实践中,对于这方面的探讨依然是寂寥的。因此,当我读到本书“杜诗意法论”一章时,既为古人孤明先发的真解妙论而兴奋,也为作者目机铄两的敏锐眼光而赞叹,更为自己读书不多、见闻舛陋而惭愧。古人的这一理论和实践,经过本书作者的阐发,应该得到学术界的响应,这是一条值得继续开拓、探索的文学诠释

^①此文与曹虹合作,已收入张伯伟《中国诗学研究》,辽海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32 页。

之途。

以上论述的几个问题,都是从这部著作中引发而来,这些问题的题旨很丰富,涉及面也很广,并不是用这么简短的篇幅能够阐释清楚的,只能姑且作一个提纲挈领式的说明。另外,我论述的侧重面和立论与作者或不尽相同,但大体而言,这些异同都能够加强本书原有的论证。现在,我还想谈一个与学术论文表述相关的问题,并与作者共勉。

“意”与“法”不仅在创作中相为表里,在学术论文中也不宜不加兼顾。上世纪 80 年代初,有学者在访问欧美期间拟发表学术论文,结果发现我们的引述方式与欧美有很大差异,于是感叹中国不仅学术不如西方,连注释方式亦不如人。这些年强调与国际接轨,文章的引述也要“国际化”。但所谓的“国际化”,无非是技术上的、符号上的,并不能等同于学术规范。比如西方学者极为重视对他人(实际上多是欧美学人)研究论著的关注,几乎不下于对原始文献的重视。华人学术圈受其影响,在自己的论著中大段引述或详细罗列相关研究,以为不这样做就不符合学术规范,这在今天海峡两岸的学术论著中已司空见惯。对于针砭游谈无根的学风、忽视既有的研究基础,这一要求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学术规范并非舶来品,中国的读书人向来就有自身的学术法则,也更适合于国人治国学之用。如果说与西方有差异,充其量在技术层面,作为学术精神的“道”是通贯的。这里,我想介绍一篇 19 世纪广东学人陈澧(东塾先生)的文章,钱穆《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就是“自陈澧始”^①,不过这里介绍的《引书法》似乎少有人注意。陈澧云:“引书有引书之法,得其法则文辞雅驯,不愧为读书人手笔,且将来学问成就著述之事亦基于此矣。”兹节录数则如下:

引书须识雅俗,须识时代先后。书之雅者当引,俗者不可引也;时代古者当先引,时代后者当后引,又或不必引也,在精不在多也。若引浅陋之书,则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矣。

所引之书卷帙少而人皆熟习者,但引其文可矣。否则当并引篇名,或注明卷数,以征核实。

引书必见本书而引之,若未见本书而从他书转引则恐有错误,且贻诮于稗贩矣。或其书难得不得不从他书转引,宜加自注云“未见此

^①收入钱穆《学箴》,自印本,1969 年版,第 81 页。

书,此从某书转引”,亦笃实之道也。

前人之说有当辨驳者,必须斟酌语气……但当辨析,不可诋謾,即辨析亦须存尊敬之意……若其人不必要尊敬,其说又乖谬足以误人,则当正言斥驳,仍不可加以谩骂,致有粗暴之病。至其人其书皆无足轻重,则更不必辨驳矣。^①

不能尽引也不再阐发,有兴趣的读者自可参看。我想强调的是,这里所指陈的“引书法”,就是中国人固有的学术规范。中国学术的引书要义即“在精不在多”五字,往昔钱穆致余英时书亦述及此义,节取如下:

鄙意凡无价值者不必多引,亦不必多辨。论文价值在正面,不在反面……即附注亦然,断不以争多尚博为胜。^②

不难看出,这与陈氏《引书法》的精神是一脉相贯的,“断不以争多尚博为胜”就是“在精不在多”。

学人撰写论著,自当重视字句章节。此虽为细故,实不宜忽略。先师闲堂在世日,言及学术文写作,不时强调文字的清通雅洁。我虽然对此保持警惕,但自忖还是难以达到先师的要求。钱穆在致余英时书中,也曾说有意为其“下笔删去十之三四”,使“所欲表达者,可以全部保留,不受削减,并益见光采”^③。余先生当年的论文,在我们读来并不觉其繁冗,而钱先生尚有“点烦”之意,这可能与他早年熟读桐城派文章有关。相传陆机作文词藻繁富,张华对他说:“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从某种意义上看,“繁”也是才华学养太“富”的表现,所谓“思赡者善敷”。故《文心雕龙》特设《镕裁》一篇,期望去除意、词的“骈枝”和“疣赘”之弊,达到“字去而意留”、“辞殊而意显”的效果。道理不难明白,但临文之际的“情苦芟繁”,难以割爱,也是人之常情。从前张岱为王白岳(佐)书撰序,特发挥“廉”字义云:“他人记事,连篇累牍所不能尽者,先生以数语赅

①黄国声主编《陈澧集》,第陆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32—233页。

②钱穆《素书楼余渚》,《钱宾四先生全集》本,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426—427页。四十多年后,余英时先生在某次接受采访时也针对此问题说:“二手材料一大堆,有些根本是没有什么价值的。真有贡献的不能遗漏。……这也是现代做学问应该注意的。这是方法论上的问题。”陈致《余英时访谈录》,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7页。

③《素书楼余渚》,第428页。

之;烦言覩缕所不能断者,先生以数字了之,故曰廉也。”^①学者能于此处悟入,下笔自有轨辙。

我与重喜共学共事近二十年,曾把酒论文,也曾品茗清谈,欣赏他的性情坦率,欣赏他的为人诚恳,欣赏他在学术上的奋进不已。杜诗研究在他看来或可告一段落,若问我继而再读何人诗,不知重喜能否猜出这个虚拟问题的答案?

2012年8月12日于百一砚斋

^①《廉书小序》,《琅嬛文集》卷一,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5页。

目 录

序	张伯伟 1
导 论	1
第一节 研究的范围和现状	1
第二节 研究的思路和问题	11
第三节 研究的方法	20

上编 《钱注杜诗》研究

——明末清初的杜诗版本、校勘、编年和笺注研究

第一章 杜集的版本和校勘	28
引 言	28
第一节 宋代至明代的杜诗校勘	29
第二节 “吴若本”与《钱注杜诗》	35
第三节 钱谦益校勘杜诗的实践及思想	50
第四节 钱谦益对清初杜诗版本的影响	53
第五节 钱笺对清初杜诗校勘的影响	63
馀 论	71
第二章 杜甫年谱和杜诗编年	75
引 言	75
第一节 年谱、诗谱和编年	78
第二节 钱谦益对前人杜甫年谱和杜诗编年的批评	79
第三节 《少陵先生年谱》的特点	90

第四节 成就及影响	98
结语和再思考	112

第三章 钱谦益的杜诗笺注	117
引 言	117
第一节 杜诗伪注	118
第二节 当时语和以诗注诗	132
第三节 时事	147
第四节 钱谦益对《洗兵马》的笺注	160
第五节 杜诗评论	185
结 语	191

中编 杜诗章法论

——明末清初的杜诗技法研究

第四章 概论	197
--------------	-----

第五章 杜诗诗题论	205
引 言	205
第一节 杜诗制题	207
第二节 诗题与诗意	218
第三节 “扣题解意”与“着题”论	225
第四节 先有题？还是先有诗？	228
第五节 诗题与章法	236
馀 论	237

第六章 杜诗分段和解	241
引 言	241
第一节 《诗集传》分章与仇注分段	244
第二节 古律长篇的分段	247
第三节 五七言律诗的分解	258
第四节 分段与章法	265
第五节 分段和解说的缺陷	270

第七章 杜甫连章诗论	276
引 言	276
第一节 杜甫连章诗的一般情况	279
第二节 明末清初杜甫连章诗论的确立	286
第三节 杜甫连章诗的结构	289
第四节 连章与解意	299
第五节 明末清初连章诗理论的确立	306
第六节 明末清初杜甫连章诗理论的影响	315
第七节 对连章诗问题的再思考	319
结 语	321
第八章 论仇兆鳌以评八股文之法注杜诗	323
引 言	323
第一节 仇兆鳌与八股文	325
第二节 以说时文之法说杜	328
第三节 起承转合	337
第四节 八股术语	338
结 语	340

下编 杜诗诠释论

——明末清初的杜诗解意研究

第九章 杜诗意法论	347
第一节 “意法”的提出	347
第二节 “意”即“性情”	349
第三节 性情与诗法:诗意与字法、句法、章法	353
第四节 性情与诗法:如何得其言外之意?	388
第五节 “意”与“法”的关系	396
第六节 “意法论”产生的理论背景	400
结 语	409
第十章 明遗民与杜诗	412
第一节 明遗民与杜诗接受	412
第二节 朱鹤龄:“得性情之至正”	421